

三國兩晉時期越窑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謝明良

壹 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始於漢代。文獻記載東漢永平八年（六十五年）明帝之弟楚王英，已曾「爲浮屠齋戒祭祀」（『後漢書』卷三二「楚王英傳」）。至東漢桓帝時（一四六—一六七）年更於濯龍宮中設華蓋，並祀老子、浮屠（『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引『東觀漢紀』）【註一】日本藤井有隣館所藏推測爲三世紀末期的著名金銅菩薩立像【註二】，雖是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遺例，然而在已發現的漢代遺物當中，究竟有多少可確定爲佛教圖像者，却始終衆說紛紜。截至目前，爲一般所接受的東漢時期佛像遺物有：四川省樂山城外東漢大型崖墓後室門額所飾淺浮雕坐佛【註三】，以及同省樂山柿子灣另一東漢崖墓後室門額所刻飾的兩尊坐佛【註四】。兩者造型相似，頭帶項光，結跏趺坐，手似做「施無畏印」。其次，四川省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錢樹陶座，座下部有雙龍啣珠圖像，上端塑三人像，中間一像結跏趺坐，有肉髻，著通身袈裟，衣褶分明【註五】，是目前中國所發現的最早的三尊像【註六】。

此外，有的研究者還主張內蒙和林格爾漢壁畫墓中，西側一幅「仙人騎白象」表現的是降身故事；山東省沂南畫像石墓中南、北兩面帶項光的立像爲佛像；山東省滕縣出土的一件刻有兩隻六牙象的東漢畫像石殘塊爲佛教圖像；新疆民豐縣尼雅墓中出土的藍色臘纈棉布上的菩薩像爲東漢時期遺物【註七】；江蘇省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中的一部份屬東漢佛教造像【註八】。其次，新疆喀什噶爾三仙洞殘存的第一層壁畫有天象圖與大小佛菩薩等，其題材不僅可能是釋迦降身的故事，其人物形態也與和田縣瑪力克阿瓦提佛寺遺址中出土的東漢初期泥塑小佛像十分類似【註九】。上述遺物有些還極待商榷，如沂南畫像石墓和連雲港孔望摩崖造像，前者的立象是否即爲佛像【註一〇】？後者的時代是否可上溯到漢代？其題材是否確屬佛

教【註二】？學術界還存在著較多的爭論。但是從四川省東漢崖墓所見諸遺物看來，中國至遲在三世紀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佛像，是無可置疑的事實。

文獻記載中國佛教到了西晉時期已經是「寺廟圖像，崇於京邑」(『出三藏記集』卷一三)【註二】。目前經正式發表的南方地區可確定為三國兩晉的佛像遺留有：湖北省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二六二年)墓出土的鎏金銅具上所飾佛像【註三】，江蘇省鎮江市跑馬山一號墓出土的金佛像牌【註四】，和三國吳境內發現的所謂「佛像夔鳳鏡」、「畫文帶佛獸鏡」【註五】，以及以越窑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所飾佛圖像。然而儘管後者的數量較多，其中有的還是出自紀年墓葬，或是器物本身就帶有紀年銘文，有絕對年代可考，是探討南方佛像的流布情形等問題的有力線索，可惜就筆者所知直到目前似乎還不見有專文探討。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因此，本文即嘗試從陶瓷史的觀點，試著探討以越窑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面所飾佛像的出現年代、分布、沿續及其表現特徵和所包涵的意義。限於筆者對於佛教美術是個門外漢，只能就陶瓷史所見的幾個問題做粗淺的討論，沒有能力結合佛教史的發展做進一步有意義的闡釋。但文中所引陶瓷諸例，或可提供研究中國早期佛教史的一點資料性的參考。

進入討論之前，應該預先說明的是：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上裝飾有佛像的作品，以一種一般飾有複雜裝飾的繅形器的數量最多。這類繅形器可分為上下二層裝置，由於上部多堆塑人物、飛鳥、百獸、樓閣，因此有「堆貼人物樓閣繅」、「飛鳥人物罐」、「飾壺」等稱呼。而多數這類作品，還於器的上部做為上部器身的大罐口頸處環置四個壺形小罐，因此又有「五壺罇」等稱呼。另外，有的研究者則推測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徵的意義，而叫它做「神亭」、「魂瓶」、「魂亭」、「骨灰罇」、「宇宙壘」、「穀倉」、或逕呼為「陶壘」【註一六】。上述諸名稱，各有偏重，有的還明顯錯誤。在還未有更恰當的统一命名出現之前，本文暫且採用「穀倉」的稱呼，其可能的用途或象徵意義將在下章詳述。

「穀倉」之外，在當時還存在一種不施其他裝飾，或僅施加少量貼飾的「五聯罐」(前者多見於南京一帶吳墓，但安徽省亦有出土；後者可見於福建省閩侯縣東晉墓)。「五聯罐」雖然早於漢代已經出現，有可能是「穀倉」的前身【註一七】，然而筆者不能同意長谷部樂爾等研究者所主張的「五聯罐」即「穀倉」的前身【註一八】，這一簡單的演變公式。考古發掘表

明，兩者於三國兩晉時期是並存的兩個樣式；除了時代因素之外，應該還要考慮到地域風格。多數「穀倉」雖於罐身上部加飾四個壺形小罐，具有「五聯罐」的形式，但兩者最大的區別則在於「穀倉」整體造型均可分為上下二層裝置，裝飾也較為繁縟。它們之間的關係自然還有待今後進一步的探討；本文考慮到上述理由和敘述上的明確性，則將它們區分開來。另外，出土的穀倉以及其他裝飾有佛像的器皿類，其文獻出處均明記於附表一、表四；以下的論述，除了必要之外，不再重覆註明。

貳 穀倉所見佛像

一、穀倉的時代及其分布

考古文物工作者對於穀倉的燒造年代，並未取得一致的見解。總括起來，有下列幾種不同的看法。(一)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常見的作品【註一九】。(二)燒造於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至西晉元康元年（三〇〇年）四十年間【註二〇】。(三)流行於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至東晉永昌元年（三二二年）八十年間【註二一】。(四)最早見於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最晚的則遲至西晉永寧二年（三〇二年）【註二二】。(五)最早的為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最晚的是西晉永興元年（三〇四年）；但從部份造型略呈僵化的作品推測，穀倉可能持續到東晉時期還有製造【註二三】。(六)出現於孫吳晚期，延續到西晉末年【註二四】。(七)東漢永康二年（一六八年）已經出現【註二五】。(八)孫吳赤烏之後（二三八—二五〇年）已經出現【註二六】。以下筆者根據歷年來出土的紀年穀倉（包括紀年墓出土的作品和穀倉本身就刻有紀年銘文的作品），試著檢討上述各家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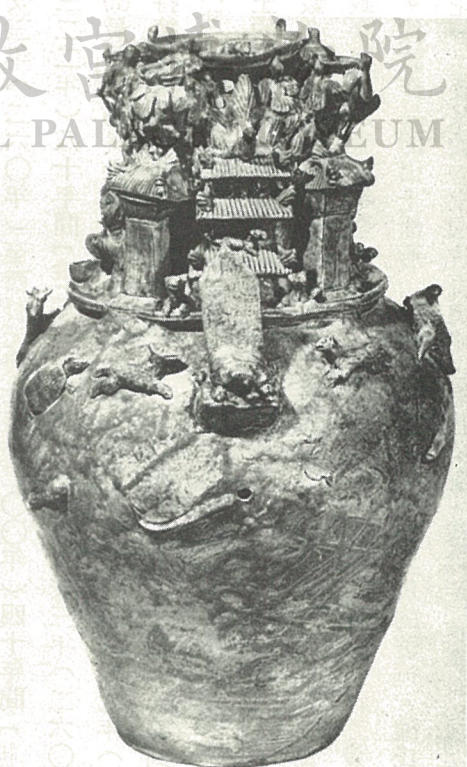
總結上述各種見解，儘管研究者對於穀倉的下限意見分歧，然而多數研究者對於穀倉出現於孫吳晚期的看法則相當一致。另一方面，鄧白氏根據杭州出土的一件穀倉與「永康二年曹氏造作」墓磚伴隨出土，從而將這件青瓷穀倉的時代提前到東漢永康二年（一六八年），則是明顯的錯誤。按該作品的出土情形，最早見於發現者陳萬里氏的著述。陳氏於『瓷器與浙江』一書先稱該作品係出自「晉代古墳」【註二七】，後又於『中國青瓷史略』修正前說，認為是「東漢時代的原始青瓷」【註二八】

。從圖版觀察【註二九】，其造型風格均與浙江省寧波慈溪西晉太康元年墓（二八〇年）【註三〇】，或江蘇省吳縣楓橋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墓（二九五年）出土的穀倉上部十分類似【註三一】。日本也藏有一件類似的作品【註三二】。因此，「永康」應係西晉惠帝的年號，永康二年當為西元三〇一年。

截至目前，出土的紀年穀倉（參見表一、表二）時代最早的要屬浙江省紹興出土的帶有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刻銘的青釉穀倉（圖一）。其次，屬於孫吳時期的紀年穀倉，還有江蘇省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鳳皇二年墓（二七三年），江蘇省南京江寧縣上坊公社天冊元年墓（二七五年），以及江蘇省金壇縣白塔公社天璽元年墓（二七六年）。非紀年墓但推測為孫吳時期的幾座墓葬，也出土有穀倉。特別是南京江寧縣殷巷公社吳墓（圖二）以及甘家巷高塢一號墓出土的穀倉（圖三），兩者



圖二 紅陶塗彩穀倉 三國、吳
高35.8cm，腹徑23.0cm，
底徑15.5cm
江蘇省江寧縣出土
取自『文物資料叢刊』8



圖一 青瓷穀倉三國、吳永安三年銘
（260年）
高46.4cm，腹徑29.1cm，
底徑16.0cm
浙江省紹興出土
取自『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



圖四 青瓷穀倉 三國、吳
高41.2cm 口徑12.6cm
浙江省蕭山縣永昌元年墓
(322年)出土，取自『新中國の
出土文物』，另參照『越窑』

圖三 黑褐釉瓷倉 三國、吳
高42.0cm，腹徑26.0cm，
底徑16.0cm
南京甘家巷出土，取自『考古』
1963-6

在造型、裝飾特徵上有許多類似之處。前者的時代推測可能在二五四～二七五年之間【註三】；後者有的研究者根據伴隨出土的陶器，而主張其年代可能在赤烏年間（二三八～二五〇年）之後【註四】。從浙江省紹興出土的永安三年（二六〇年）紀年穀倉所呈現出來的極為成熟的技法，以及各地吳墓出土的穀倉之間所表現的類似風格看來，穀倉於孫吳晚期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流行，有可能在三世紀的五十年代已經開始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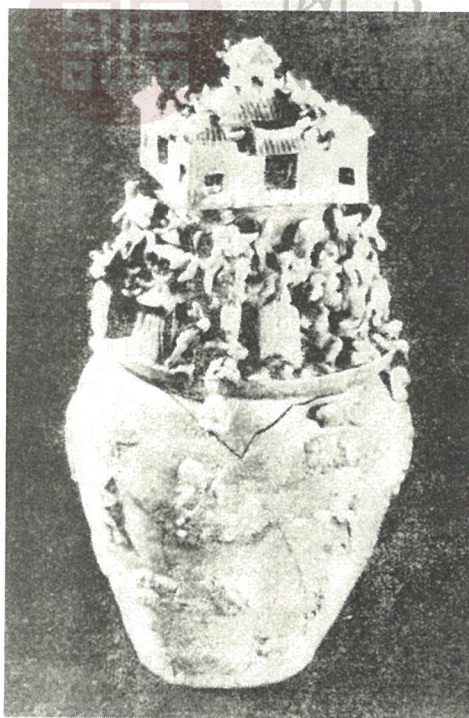
兩晉時期的紀年穀倉數量更多。計江蘇省七件（其中吳縣楓橋林場獅子山一號墓出土兩件），浙江省十件。而絕大多數為西晉時期的墓葬，屬於東晉的，僅見有浙江省杭州三台山永昌元年墓（三三二年）和蕭山縣永昌元年墓（三三二年）等兩處。後者蕭山縣出土的作品，由於造型和裝飾風格均與紹興出土的吳永安三年紀年穀倉極為類似（圖四），因此有的研究者

將其年代定為孫吳時期【註三五】。

從表一、表二所列紀年穀倉的出土實例看來，最晚的作品可見於浙江省三台山東晉永昌元年墓（三二二年），反駁了部份研究者把穀倉的下限定為西晉，或將其下限延續到南北朝的看法。三台山永昌元年墓雖然未有正式發掘報告公諸於世，僅見於馮先銘氏一九七三年論文中的引述，但是考慮到蕭山縣東晉墓也出土有穀倉；以及長谷部樂爾氏所指出的，部份作品造型較為僵化等現象，穀倉延續到東晉初期還有製作是完全可能的。以越窰青瓷為主

的穀倉，到了南朝已經絕跡，這與越窰在南朝已不再流行燒造明器的傾向吻合。

考古發掘還表明，穀倉流行於江蘇、浙江兩個省份（參見表一、表二）；其次安徽省、江西省亦有少量出土（參見表三）。此外，本世紀五十年代湖南省桂陽北門外第一中學原校址內，曾出土兩件「陶壘罐」，形制花紋複雜特殊，「上面似有



圖六 青瓷穀倉 西晉元康二年銘
（292年）
高59.2cm
江蘇省吳縣出土
取自『文物資料叢刊』3



圖五 青瓷穀倉 西晉元康元年銘
（291年）
高50.0cm 口徑13.4cm
浙江省平陽縣出土
取自『越窰』

許多佛像及鳥等」【註三六】。可惜簡報中未掲載圖版，也未涉及作品時代，詳情不得而知。

穀倉的胎質，以青瓷佔絕大多數。但間有黑釉、黑褐釉或紅陶加彩（參見表一〇三）。以紀年穀倉而言，時代最早和最晚的作品均出於浙江省，即以浙江省的流行時限最長。而觀察吳至西晉的青瓷穀倉，造型不見有顯著的變化。部份西晉時期的青瓷穀倉，如浙江省平陽縣鰲江元康元年墓（二九一年）（圖五）或江蘇省吳縣獅子山元康二年墓（二九二年）（圖六）出土的作品，下部壘均略趨瘦長，而以前者為甚。但詳細的編年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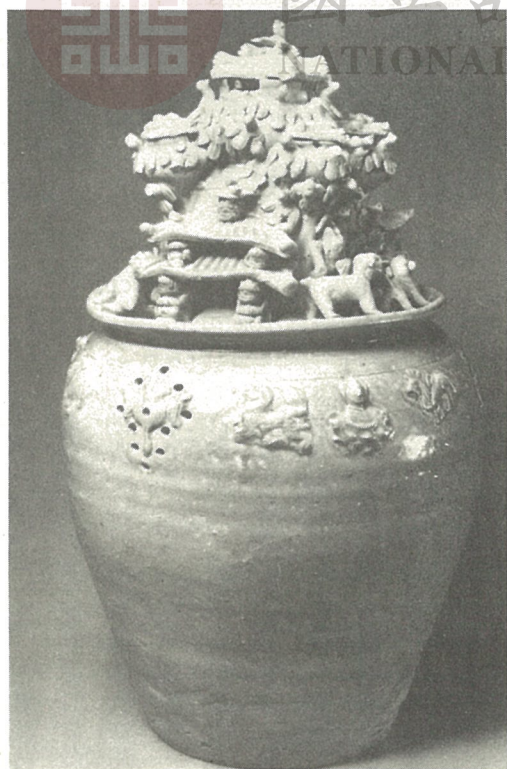
二、穀倉所見佛像裝飾

依據筆者的初步統計，見諸報導的加飾有佛像的穀倉至少有十六件。其中江蘇省出土九件，浙江省出土六件，另一件現藏於日本的作品出土地點不明。這個不完全的統計，還不包括若干光是據圖版無法確認是否裝飾有佛像的數例，但也清楚地表明了飾有佛像的穀倉，佔著極為突出的比率（參見表一〇三）。

觀察穀倉所飾佛像，不外有下列三種

裝飾技法。（一）將模印成型的佛像，貼飾於鑲形器身的肩腹處。（二）將模印成型的佛像，貼塑於鑲形器身上方所置樓闕近處或罐口附近。（三）於下部鑲形器身肩腹處和上部近樓闕位置，均飾有模印佛像。第一種技法最為常見，所飾佛像數量不一，一般為一〇三尊（圖七）。但如江蘇省金壇縣唐王公社吳墓所出作品，加飾的佛像達七尊

三國兩晉時期越窑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圖七 青瓷穀倉 西晉
高48.0cm 腹徑28.7cm
取自『南京博物院展』



圖九 青瓷穀倉 三國吳～西晉
高36.9cm
取自『陶磁大系』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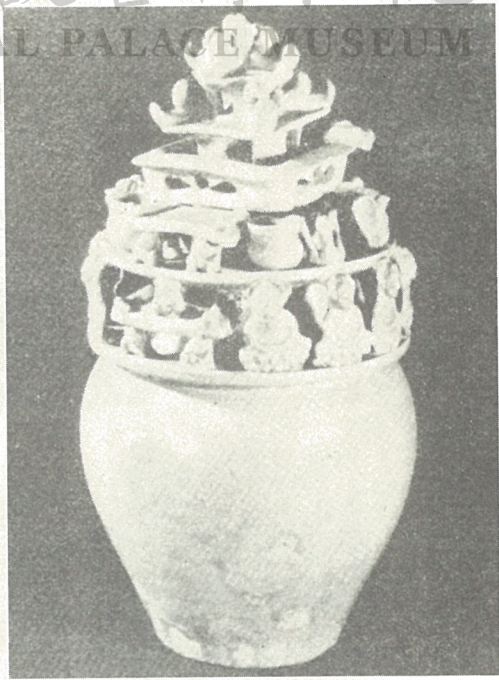
圖八 青瓷穀倉 三國、吳
高47.5cm 腹徑28.0cm
江蘇省金壇縣出土
取自『文物』1977-6

之多（圖八）。第二種裝飾技法，如浙江省平陽縣西晉元康元年（二九一年）帶碑文的青釉穀倉，於上部所置樓闕下方。敞口罐口緣上下，飾有坐佛數尊，裝飾部位不甚明顯（同圖五）。反觀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吳墓所出黑褐釉穀倉，罐形器身上置三層貼塑，最上一層方形屋宇之下，屋壁四面各置一佛，又有七尊坐佛圍繞方屋四周，且均置於與瓶口相連的盤座之上。在瓶頸正面開一門，中置一佛，門前兩旁置雙闕，闕旁各有一小罐，後部對應處亦有二小罐，除正面外，四小罐間共飾佛像八尊（同圖三）後者裝飾有多數佛像的穀倉，風格較特殊，與一般常見的穀倉不同，但與日本所藏青瓷穀倉（圖九）或江蘇省吳縣獅子山西晉元康五年墓（二九五年）（圖一〇）以及江寧縣殷巷吳墓出土的紅陶加彩穀倉有共通之處。特別是和殷巷吳墓的作品更為接近。殷巷吳墓的紅陶穀倉上部，除上層屋宇之外，下面還可分二層

，下層近下部饌形器身口緣處飾七尊背有佛光的蓮花坐佛（同圖二）。第三種裝飾技法亦較罕見，可以江蘇省江寧縣上坊天冊元年墓（二七五年）所出青瓷穀倉為例。該穀倉裝飾繁縟，既於下部饌形身部交錯貼飾二層紋樣，坐佛夾雜於飛羊、鋪首、麒麟之間，又於上部堆塑坐佛數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
同圖九 局部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一一 青瓷穀倉 三國、吳
高41.8cm 腹徑22.8cm
底徑14.2cm
南京江寧縣天冊元年墓（275年）
出土，取自『文物資料叢刊』8

圖一〇 青瓷穀倉 西晉
高46.5cm
江蘇省吳縣元康五年墓
（295年）出土
取自『文物資料叢刊』3

圖一一。

以裝飾手法而言，穀倉所飾佛像數量不一，但多者常爲七尊一組。其裝飾位置，饅形身部所飾佛像多見於肩腹處；至於裝飾在上部樓閣近處者，所在位置亦多相似。此外，穀倉所見佛像，一律是坐姿，手結定印，披通肩大衣，半圓形的衣紋一般較稀疏，居中下垂。大多數佛像都有明顯的肉髻和項光，跌坐於蓮花座上。江蘇省金壇縣唐王公社吳墓青瓷穀倉所飾坐佛，還可清楚見到坐佛兩側的一對獅子（圖一二）。佛像均爲模製；多數穀倉所飾佛像造型極爲接近。這一方面說明了部分穀倉可能來自同一地區的窯場；也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於佛教這一新興的宗教，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共通的認識。但上述佛像却又與鳥、龜、羊、熊等禽獸或鳳凰、麒麟、仙人騎獸等靈異屬雜並置，反映出中國早期佛教是結合在本國的傳統信仰之中。這還可以從湖北省鄂城寒溪公路出土的一件三世紀中期的吳鏡【註三七】，既裝飾有佛像，又裝飾有東王公、西王母等中國傳統神仙像一事不難想像得到。

三、穀倉的產地和用途

穀倉有什麼作用？它的產地在那裏？這不僅涉及陶器史上的問題，也是探討佛教在當時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傳布的重要線索。目前所見飾有佛像的穀倉，其胎質有青瓷、黑褐釉及紅陶三



圖一二 江蘇省金壇縣出土青瓷穀倉（同圖八）之局部

種。後者有的還施加彩繪，而以青瓷佔絕大多數。南京江寧縣殷巷吳墓所出者為紅陶加彩，南京甘家巷高場一號墓則出土了黑褐釉穀倉。兩者的下部纏身均較肥矮，上方貼塑所飾坐佛圍繞盤形口緣一周，裝飾風格和造型特徵有共通之處，有可能來自同一地區。從穀倉的分布及裝飾風格看來，它們無疑是來自江南地區的窖場，而以南京鄰近地區的窖場可能性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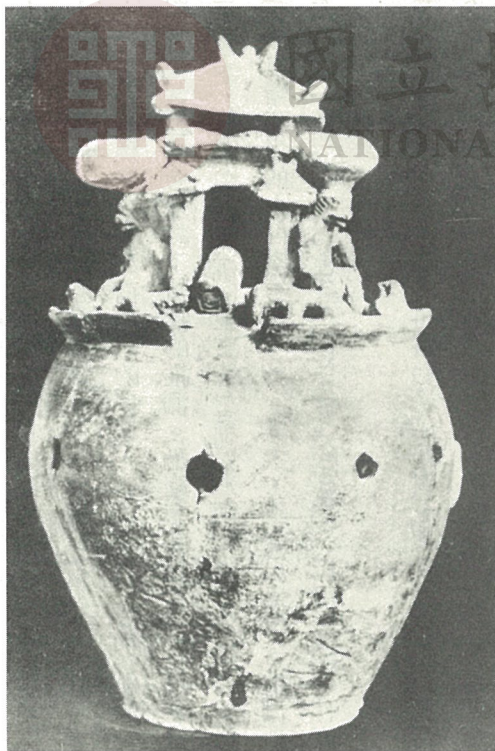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早於數十年前研究者就曾對青瓷穀倉的產地做了概括的推測。如羅振玉氏在『古明器圖錄』一書中就將他得自劉體智的穀倉定為「吳會稽陶壘」【註三八】。大村西崖【註三九】金重德【註四〇】兩氏也認為羅振玉所藏的穀倉是越窖作品，小山富士夫氏更進一步地主張上述穀倉係來自浙江省的九巖窖【註四一】。其次，陳萬里氏也曾推測浙江省杭州出土的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紀年穀倉是早期越窖作品，【註四二】，George Fumropoulos 氏所藏的一件青釉穀倉，也被認為是浙江省九巖窖的作品【註四三】。

近年來的考古發掘更提供了探討青瓷穀倉的重要線索。這不僅可將穀倉的胎質、青釉的呈色以及伴隨出土的陶瓷，比照近年來瓷窖出土品得到印證；部份青瓷穀倉所飾龜趺碑文更是直截地透露了穀倉的產地。如「元康四年九月九日〔造〕□州會稽」（浙江省餘姚出土）；「元康元年八月二日〔造〕會稽上虞」（浙江省平陽縣出土）；「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起會稽」（江蘇省吳縣出土）；「出始寧，用此□」（江蘇省吳縣出土）等碑銘（參見表一、表二），均明白地指出其主要產地在「會稽上虞」或「始寧」（今浙江省上虞縣南），屬越窖作品。其次，考古發掘還表明，除越窖之外，浙江省甌窖（浙南溫州一帶）和婺州窖（浙江省中部金華地區）亦有少量生產。如浙江省武義縣三國墓出土的青釉穀倉（圖一三）或金華地區古方第十二號三國墓、第二五號西晉墓出土的青釉穀倉，胎質與婺州窖窖址的標本一致，屬婺州窖作品【註四四】。它們顯然是受到越窖的影響【註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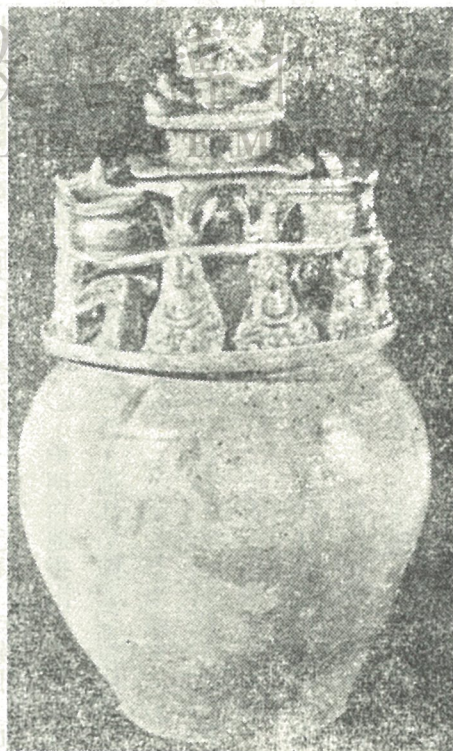
最早明確地指出穀倉用途的是張拯亢氏。張氏於本世紀三十年代調查紹興出土的古墓葬隨葬品時，依其造型裝飾將穀倉區分為「神亭」和「五壺罇」兩類。前者指上部「堆砌樓臺」、「瓶肩浮彫武士」的作品；後者指口上「堆砌小罇五」罇上飾有人物、禽獸，又有的「上堆牌樓碑亭人物鳥獸」。而「神亭」所飾亭臺是取「神所馮依之意」；「五壺罇」上所堆飾的牌樓碑亭人物鳥獸是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安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註四六】。其後研究者在紋及穀倉性質時，有的認為是香爐【註四七】、薰籠之類【註四八】；有的推測是具有宗教用途【註四九】；有的認為是祭器【註五〇】；也有的認為

是骨灰罈【註五一】；而絕大多數的研究者則主張是殉葬用的明器。穀倉是否還具有宗教上的所謂祭器的性質？目前還難遽下斷言；然而三國兩晉時期的香爐或薰籠已由考古發掘所得到的衆多遺物予以證實，它和穀倉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其次，考慮到當時的喪葬習俗，或出土有穀倉的墓葬構築，以及有的墓葬還伴隨出土有腐朽的人骨等情形看來【註五二】，它不會是骨灰罈。這還可以從部份穀倉於罈形身部鑄鑿有孔不適用於裝盛骨灰的情形得到旁證。

筆者同意穀倉是明器的看法。這不僅可以從穀倉的裝飾題材得到說明，部份穀倉上方龜趺所刻飾的銘文更提供了直接的證據。以裝飾題材而言，南京鄧府山一號墓出土的穀倉上方樓闕之間，小門之外，放置有一棺材，棺材兩側，兩孝子相對跪伏，五體及地，充分地表現出喪葬時的悲哀場面（圖一四）。以碑文內容而言，羅振玉氏所藏一器碑文爲「會稽出始寧（寧）



圖一四 紅陶穀倉 三國、吳～晉
高40.0cm 口徑23.0cm
底徑14.8cm
南京鄧府山出土
取自『全國基本建設工程中
出土文物展覽圖錄』



圖一三 青瓷穀倉 三國、吳晚期
高46.0cm 腹徑28.0cm
底徑16.0cm
浙江省武義縣出土
取自『考古』1981-4

用此喪葬，宜子孫作更高，遷衆無極」，這裏更是明白地指出穀倉是喪葬的用器。類似內容的穀倉碑文還有「永安三年時，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億）萬歲未見英（央）」；或「元康出始盛，用此靈，宜子孫，作更高，其樂無極」等【註五三】。其書文內容與常見的漢代明器鎮墓瓶（朱書陶瓶）的部份詞句很接近；如漢初平四年（一九三年）王氏朱書陶瓶即有「今後曾財益口，無有央咎」書文【註五四】。此外也有書「子孫富貴豪強，貲財千億，子孫蕃息」等文字的鎮墓陶瓶【註五五】。穀倉是否還兼有安撫亡魂勿爲祟生人的鎮魂用途，目前還難遽下斷言，但一般所飾繁縟裝飾的表現內容，無疑就是象徵生人富貴、多子多孫、五穀豐登、百獸率舞或喪葬禮儀的熱鬧場面。張拯亢氏所形容的：「取子孫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可說是對於穀倉功能的貼切描述。因此，無論是碑文內容還是裝飾特徵，都說明穀倉是做爲喪葬用的明器。將佛像裝飾於明器穀倉，再度說明了當時佛教是結合在傳統的民間信仰之中。

叁、其他以越窑青瓷為主的陶瓷器所見佛像

本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的布蘭克史東氏（A. D. Brankston）於「九巖越州窰」一文中，首先揭載了幾尊越窑小型坐佛（圖一五）以及一件器身貼飾有佛像的青瓷豆（圖一六）。五十年代，蔣玄伯等著『中國瓷器的發明』一書中也收錄了一件黃青釉小型坐佛（圖一七）；其造型特徵與布蘭克史東氏揭示的坐佛十分類似。上述小型坐佛有項光或背光，跌坐於蓮花座上；有的明顯於身部兩側置一對獅子，佛的造型特徵表現得十分清楚。目前雖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來證明這幾尊小型坐佛到底是獨立的佛像？還是青瓷器皿類的附屬配件？但至少可以確定越窑除生產有貼飾佛像的穀倉，還燒造有裝飾佛像的其他青瓷器皿。

三十年來，雖然不見有三國兩晉時期青瓷小坐佛出土的正式報導，但江蘇省南京趙士崗吳鳳皇二年墓（二七三年）曾出土過幾尊報告者稱爲「人像」的小型坐像【註五六】。上述「人像」均係紅陶胎，薄施淡茶黃釉。從圖片觀察，似不見有明顯的項光或肉髻，然均結跏趺坐，身披通肩大衣，衣紋稀疏，居中下垂，底置蓮花座。「人像」兩側似還飾有一對異獸（獅？）（圖一八）。值得注意的是，該墓還出土了貼飾佛像的黃釉穀倉，（圖一九），而「人像」的造型特徵即與穀倉所飾坐佛



圖一五 青瓷小坐佛 六朝 浙江省九巖窑址採集
取自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圖一六 青瓷豆 西晉 徑21cm
取自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圖一七 青黃釉小坐佛 晉
浙江省紹興出土(?)
取自『中國瓷器的發明』

如出一轍，並且與一九七二年江蘇省鎮江市唐王公社等吳墓出土的穀倉所飾坐佛造型極為相近（同圖一二）。因此這幾件「人像」應該就是有確切年代可考的珍貴的早期佛像資料。

考古發掘表明三國吳、西晉時期生產有不少額上裝飾類似模倣釋迦的「白毫相」陶瓷俑。如湖北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二六二年）出土的青綠釉陶俑【註五七】；湖南省長沙金盆嶺西晉永寧二年墓（三〇二年）出土的一批青瓷俑【註五八】；以及南京光華門外黃家營吳或西晉墓出土的施薄黃釉的跪俑【註五九】。上述陶瓷俑額上飾物是否



圖一八 三國，吳小坐佛 左高4.3cm 中高4.4cm 右高4.4cm
南京趙士崗鳳皇二年墓(273年)出土，取自『南京六朝陶俑』



圖一九 青釉穀倉 三國、吳
高34.3cm 腹徑23.8cm
南京趙士崗鳳皇二年墓(273年)
出土, 取自『南京博物院』



同圖一九 背面

確屬佛教的「白毫相」？學術界還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塚本善隆氏認為蓮溪寺的釉陶俑應是神仙般的佛像或是佛像般的神仙【註六〇】。中國方面的研究者也主張蓮溪寺、金盆嶺的陶瓷俑額上的飾物確屬「白毫相」，是佛教影響下的產物【註六一】。從蓮溪寺釉陶俑還伴隨出土有刻畫佛像的鎏金銅具看來，同墓陶俑額上所飾「白毫相」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響。

另一方面，見於中國方面著述的三國、西晉時期貼飾有佛像的青瓷器皿，除穀倉之外，至少有五件。它們分別是浙江省吳興西晉墓的青瓷雙耳罐（圖二〇）、湖北省宜昌西晉墓的青瓷博山爐（圖二一）、湖北省鄂城六朝墓的青瓷洗、以及出土地點不明的青瓷奩（圖二二）和帶繫罐（圖二三）（參見表四）【註六二】。五件作品中，除湖北省宜昌市的博山爐見於正式的發掘報告書，其餘均僅見於研究者的間接引述。其次，『中國陶瓷史』一書亦提及三國、兩晉的瓷器，如「穀倉罐和碗，鉢等器物出現了佛造像和忍冬紋的裝飾」【註六三】，可惜詳情不得而知。此外，日本的私人藏品也見有裝飾佛像的西晉時期越密青瓷奩【註六四】。這些片斷不完全的資料，却也清楚地反映出佛像是以三國、西晉越密青瓷為主的陶瓷器上的裝飾題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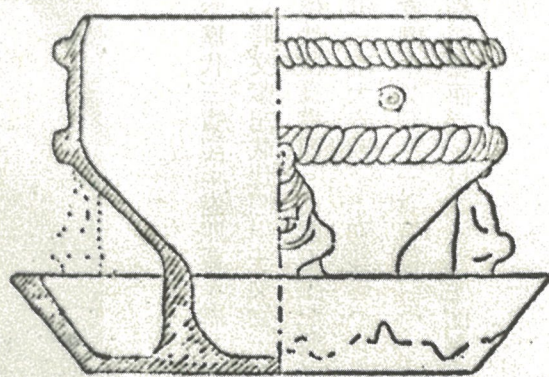
圖二〇 青瓷貼花佛像雙耳罐 西晉

高6.7cm 口徑6.6cm

江蘇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墓
(296年)出土,取自『越窑』

一。
從裝飾風格觀察，加飾佛像的青瓷器皿，除湖北省宜昌市的作品為博山爐，佛像飾於托口與爐身相接處，似做為撐托的支足之外；其餘作品（包括布蘭克史東氏揭示的青瓷豆和東山健吾氏收藏的青瓷奩）佛像一律貼飾於器物的肩部或腹部所飾帶狀網紋或斜方格紋之上。裝飾部位相當一致，具有典型的時代風格。過去由於缺乏可靠的地下材料，布蘭克

史東氏曾將上述青瓷豆的年代定為五世紀的作品【註六五】；近年來的出土資料則表明，帶網狀紋出現於吳的晚期，流行於西晉，至東晉初年已經消失【註六六】。其次，比較紀年墓出土的同類作品造型，可以認為上述作品均屬西晉時期。所飾佛像與穀倉裝飾的佛像極為類似，均呈坐姿，手結定印。著通肩大衣，有項光，且都是模印成型後再貼飾於器的肩腹部位。佛像一般為二——三尊；多數與中國傳統圖案交錯排列。如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佛像奩（同圖二二）或布蘭克史東氏介紹的青瓷豆（同圖一六），佛像均與鋪首啣環對稱並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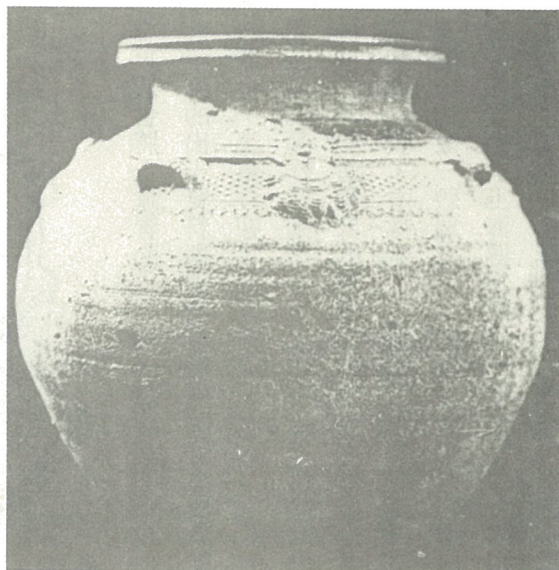
圖二一 裝飾有佛像之青釉博山式薰爐
西晉 口徑12.0cm 高11.0cm
托口徑16.0cm 底徑14.0cm
高2.2cm 湖北省宜昌市出土
取自『江漢考古』1984-1

肆、小 結

有關佛教初傳中國的種種傳說，中外的研究者已經有過許多的討論。『歷代三寶記』卷四說竿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彩」，又說「孝桓帝世又以金銀作佛形像」；【註六七】將文獻記載比照出土文物，可以肯定中國至遲在東漢時期已經出現佛像。另一方面，江南地區早期佛像造像的實際情況，依然極爲模糊。文獻上雖記載吳大帝孫權崇尚佛教，赤烏四年（二四一年）——（一說赤烏十年，二四七年）於南京建立起第一座大寺廟——初建寺（『出三藏記集』卷一三）；著名的康僧會也在三國吳都建業「設像行道」；吳孫皓的衛兵更在後宮園中見到「一立金像」（『出三藏記集』卷一三），後者被認爲可能是釋迦像【註六八】。然而遺物不存，詳情不得而知。從這點而言，以越窰爲主的陶瓷器，或吳鏡等手工藝品所見佛像裝飾，無疑是理解南方佛教的重要線索之一。



圖二二 青瓷貼花佛像奩 西晉
高10.6cm 口徑23.3cm
取自『越窰』



圖二三 貼花佛像帶繫罐（釉已剝落）
三國、吳～西晉
浙江省紹興出土（？）
取自『中國瓷器的發明』

過去，長谷部樂爾氏在論及六朝陶瓷時，指出飾有佛像的青瓷穀倉最早實例，見於江蘇省吳縣西晉元康五年墓（二九五年）出土的作品【註六九】。事實上，早於孫吳鳳皇二年墓（二七三年）出土的穀倉已經飾有佛像（同圖一九）。其次推測為孫吳時期的非紀年墓出土的加飾佛像穀倉，在江蘇浙江兩省份亦見有數例（表一、表二）。特別是江蘇省南京甘家巷高場出土的穀倉（同圖三），從伴隨出土的陶器看來，其年代可能在赤烏（二三八——二五〇年）之後；因此，有的研究者主張該穀倉是中國南方地區現存最早的佛教藝術品【註七〇】。以紀年穀倉而言，如前所述，最早的作品為吳永安三年（二六〇年，浙江省紹興出土）；最晚的作品則遲至東晉永昌元年（三二二年，浙江省杭州出土）。而裝飾有佛像的紀年穀倉最早的實例為吳鳳皇二年墓（二七三年，江蘇省南京出土），而晚至西晉元康元年墓（二九一年，浙江省平陽縣出土）還可見到。再結合其他裝飾有佛像的青瓷器皿的年代，可以得知，陶瓷器上裝飾佛像約流行於孫吳末期至西晉中期。以紀年作品而言，浙江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二九六年）磚墓出土的貼飾佛像青瓷雙耳罐（同圖二〇）是目前最晚的實例。其次，湖北省武昌蓮溪寺吳永安五年墓（二六二年）出土有刻飾佛像的銅具；而裝飾有佛像的所謂「佛像菱鳳鏡」、「佛獸鏡」等鏡式，據王仲殊氏的說法，它們當流行於三世紀中期【註七一】。這樣看來，早於三世紀中期，中國南方的佛教造像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普及。這與孫權末年康僧會立寺傳教，吳國「大法（佛教）遂興」（『高僧傳、康僧會傳』）等文獻記載一致【註七二】。

從部份穀倉碑文所記「出始寧」、「會稽」等銘文得知，多數青瓷穀倉係來自浙江省的上虞、會稽一帶，屬越窑作品。相對的，如前所述南京江寧縣殷巷吳墓出土的紅陶加彩穀倉有可能燒造於南京鄰近地區的窑場。另一方面，目前所見出土於湖北省、湖南省、浙江省等省份的飾有佛像的三國鏡，亦均為吳鏡，不見有華北的魏鏡【註七三】。吳鏡的鑄造地點主要有兩處，一是會稽郡的山陰（今浙江省紹興）；一是江夏郡的武昌（今湖北鄂城）。山陰的工匠有時還到武昌鑄鏡，使武昌成為吳的鑄鏡中心【註七四】。這些事實，不僅表明了佛像裝飾是孫吳、西晉時期南方手工藝作品經常採用的題材之一，其出土分布、生產地、也與吳的譯經曾經在武昌並盛行於建業一事吻合。（天竺沙門維祇難曾於黃武三年（二二四年）攜帶『法句經』梵文到武昌，由竺將炎和支謙二人譯成漢文。參見『中國佛教』第一輯一二頁）

文獻記載，東漢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年）至四年（一六一年）日南邊郡外等南海諸國入朝貢獻，因此除了經由西域傳

入中國的東漢時期華北佛教之外，早於二世紀後半，南方佛教可能隨著與南方諸國通商而傳入交趾和廣東。〔註七五〕特別是交趾、會稽爲當時海上交通的據點，佛教還有可能經由海路傳入中國〔註七六〕。浙江省會稽雖是裝飾有佛像的越窰青瓷和吳鏡的主要生產地之一，可惜目前還無足夠的證據可以證實上述手工藝作品的佛教因素係來自南方的海上之道。

另一方面，自漢通西域以來，佛教雖以洛陽爲中心，但已逐漸傳至丹陽、彭城、廣陵等江淮一帶；特別是靈帝末年，避難投奔江南者不在少數，連安世高也是爲避「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高僧傳』「安世高傳」），足跡及廬山、廣州和會稽〔註七七〕。大量的北人南徙，或許將佛教帶入淮河或長江流域。著名的竿融築寺鑄佛（『後漢書』卷七三「陶謙傳」及『三國志』吳志、卷四「劉繇傳」）以及楚王英的禮拜浮圖（佛）、黃老等傳說（『後漢書』卷三二「楚王英傳」），前者反映了東漢靈帝末年至獻帝時期彭城（徐州）的佛教情形；後者楚王英的轄地亦是以徐州爲中心，沿淮河南北一帶〔註七八〕。其次發掘南京太平門外棲霞山甘家巷東吳M二九號墓出土的建衡二年（二七〇年）鉛地券，其券文有「處士徐州廣陵堂邑」等記載〔註七九〕；而曹操恐江濱郡爲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故「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三國志』吳志「孫權傳」）；並且青州、徐州、汝州、沛州等地人民亦大批歸附東吳，至於徐、泗、江、淮之地無人居者數百里（『三國志』吳志、「孫韶傳」）〔註八〇〕。上述記載，反映了佛教開化較早的彭城、廣陵等地居民，已經逐漸移居江南；以越窰青瓷爲主的陶瓷器上所飾佛像，或有可能受到南下佛教的影響。

綜觀三國吳、西晉陶瓷器上所見佛像裝飾，佛像均與中國傳統民俗圖樣羣雜並列，交互布局。其中以穀倉的圖樣最爲繁縟；包括有鋪首、麒麟、仙人騎獸、鳳凰、龜、鳥以及人物百獸等等。江蘇省吳興縣西晉元康六年墓（二九六年）出土的貼飾佛像的雙耳罐，其佛像所據位置在同時期同種器形的陶瓷器上一般都飾以鋪首啣環或異獸〔註八一〕；從而得知，佛像在當時曾被做爲一種辟邪或象徵吉祥的紋樣。其次，陶瓷器上所見佛像於器物整體的位置，均非高高居上莊嚴不可逼視，而僅是做爲一種裝飾題材罷了。湖北省宜昌市出土的青瓷博山爐，佛像甚至被當做支撐托的器足，說明了南方地區佛教雖已相當流行，然而顯然還缺乏後世那樣的崇敬。將佛像飾於祈保生人富貴多子的明器穀倉，不僅說明了當時中國接受佛教，已偏重其祈保福祿的現世利益。也與『牟子理惑論』所記載的東漢明帝營建其壽陵顯節陵時，其上做佛圖之像的傳說，以及後世石窟

寺院或單獨佛像的造像題記經常與死者有關一事，不謀而合【註八二】。楚王英並祀黃老（黃帝、老子）、浮屠（佛），桓帝共祀浮圖、老子等事，清楚地表明當時的人們是將佛教與祈求長生不老，崇尚無爲的黃老信仰等同並置。反映出中國佛教的特有基本性格，以及外來宗教爲了在中國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與中國固有的思想、風俗信仰相互調和的一個側面。

東晉以後，佛教已在中國取得廣大的擁護和較爲鞏固的地位，人們對於佛教的信仰更趨虔誠。東晉以後的陶瓷器上很少見到佛像裝飾【註八三】，說明了佛像已不再被任意地做爲裝飾圖案使用，代之而起的則是將象徵佛、清淨的蓮花瓣紋加飾於陶瓷器上【註八四】。蓮花瓣紋瓷器到了南朝更得到全面的發展。

〔附記〕一、脫稿後，根據新的報導，南京市博物館也收藏有一件貼飾佛像的青瓷盤口小壺。該小壺係出土於南京中華門外鄧府山西晉墓，高六、七厘米，肩部印弦紋及斜方格紋並且於兩耳之間貼飾坐佛各一尊，坐佛後有背光，下有蓮花座，因此穀倉之外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上加飾有佛像的作品又添加了一個實例。（報告參見李蔚然〈南京市博物館〉「試述南京地區六朝墓葬青瓷來源及其有關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一九八一』收一三五—一三九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

二、本文的完成承蒙日本成城大學東山健吾教授的指導，提供筆者不少寶貴的意見，特此致以謝意。

表一 江蘇省出土穀倉

(○表示裝飾有佛像的穀倉)

編號	出土地	紀年(西元)	胎釉	佛像	裝飾部位	出土年	備註
1	江蘇省南京鄧府山 (DFM一)	(1)孫吳、東晉初 (2)漢末、六朝初	紅陶	不明		一九五一	據發掘報告書第七頁，稱出土有穀倉的一號墓的時代「早可至孫權時，遲可至東晉初年」。但第八頁則又稱鄧府山一、二號墓的時代為「漢末或六朝初」。
2	江蘇省宜興	晉	青釉	不明		一九五二年發現 一九五三年發掘	
3	江蘇省南京光華門 外趙士崗	吳鳳皇二年 (二七三)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五五	同南京江寧趙史崗七號墓，鳳皇二年鉛地券。
4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 東山	(1)吳 (2)西晉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五七	據「南京博物院展」一九八一年，的說明為「東吳」的作品。另外「江蘇六朝青瓷」一九八〇年，則認為是「西晉」時期的作品。
5	江蘇省南京甘家巷 高場	吳	黑釉	○	下部罐身及 上部貼塑	一九五八	
6	江蘇省南京高家山 二號墓	吳、東晉初	青釉	不明		一九六一、六二	
7	江蘇省南京市郊板 橋鎮	西晉永寧二年 (三〇二)	青釉	不明		一九六四	「永寧二年……」鉛地券
8	江蘇省南京江寧縣 秣陵公社	西晉太康四年 (二八三)	陶	不明		一九六五	報告書記太康四年為西元二八四年，應為二八三年之誤。「太康三年……」墓磚。
9	江蘇省句容縣石獅 公社	西晉元康四年 (二九四)	青釉	不明		一九六六	「元康四年」墓磚。
10	江蘇省淮陽	西晉	青釉	不明		一九七二	
11	江蘇省金壇縣白塔 公社	吳天璽元年 (二七六)	青釉	不明		一九七三	「天璽元年……」墓磚。
12	江蘇省金壇縣唐王 公社	吳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七三	
13	江蘇省南京西崗	西晉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七四	
14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 場獅子山一號墓	西晉元康五年 (二九五)	青釉	○	上部堆塑	一九七六	共出土二件，其中一件裝飾佛像。
15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 場獅子山二號墓	西晉元康二年 (二九二)	青釉	不明		一九七六	龜趺牌額刻「元康」，以下三行刻「出始盜，用此□□」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
16	江蘇省吳縣楓橋林 場獅子山三號墓	西晉元康年間 (二九一、二九二、二九三)	青釉	不明		一九七六	

註

[illegible]

表二 浙江省出土穀倉

(○表示裝飾有佛像的穀倉)

編號	出 土 地	紀 年 (西元)	胎釉	佛像	裝飾部位 (佛像)	出 土 年	備 註
1	浙江省杭州	西晉永康二年 (三〇一)	青釉	不明		一九三五	「永康二年曹氏造作」磚。
2	浙江省紹興	西晉太康三年 (二八二)	青釉	不明		一九三六~三七	「太康三年作」磚。
3	浙江省紹興	吳晉	褐釉	不明		一九三六~三七	
4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一九三六~三七	
5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一九四三	上部殘器三件，上部貼飾殘件四件 (小形屋二，龍頭二)。
6	浙江省諸暨	西晉永康元年 (三〇〇)	青釉	不明		一九五六	「永康元年太歲在庚申作」磚等。
7	浙江省平陽縣	西晉永康元年 (二九一)	青釉	○	上部堆塑處	一九六六	「元康元年八月二日 (造) 會稽上虞」銘文。
8	浙江省慈溪	西晉太康元年 (二八〇)	青釉	不明		一九七七	
9	浙江省上虞	西晉	青釉	不明		一九七八	
10	浙江省金華地區武義縣	三國晚期	青釉	○	上部堆塑處	一九七九	
11	浙江省衢州	三國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八〇	伴隨出土有「建安廿四年」銘神獸鏡。
12	浙江省紹興	吳晉	青釉	不明		不明	
13	浙江省紹興	吳永安三年 (二六〇)	青釉	不明		一九三七	「永安三年時，富且洋，宜公卿、多子孫、壽命長，千意萬歲未見英」銘文。
14	浙江龍山	吳	青釉	○	下部罐身	一九一一?	「會稽出始寧，用此喪葬，宜子孫作吏高，遷衆無極」銘文。
15	浙江省蕭山縣	吳	青釉	○	下部罐身	不明	東晉永昌元年 (三二二) 磚墓出土。
16	浙江省平陽縣	西晉永康三年 (二九三)	不明	不明		不明	
17	浙江省餘姚	西晉永康四年 (二九四)	青釉	不明		不明	「元康四年九月九日 (造) 口州會稽」銘

表三 其他省分出土或出土地點不明國內外收藏的穀倉

(○表示裝飾有佛像的穀倉)

編號	出 土 地 紀 年 (西元)	胎 釉 佛 像 裝 飾 部 位 (佛像)	出 土 年	備 註
1	安徽省蕪湖赭山 (m一〇八)	魏 ₂ 晉 紅薄釉 不明	一九五四	殘片(屋頂、花柱、人物、鳥獸等)
2	安徽省蕪湖赭山	魏 ₂ 晉 青釉 不明	一九五四	殘片三件。
3	江西省瑞昌馬頭	西晉前期 青釉 不明	一九七二	
4	不明	吳 ₂ 晉 青釉 不明	不明	Eumorfopoulos氏藏
5	不明	西晉太康十年 (二八九) 青釉 不明	不明	上海藏
6	不明	吳 ₂ 晉 青釉 ○ 上部貼塑	不明	日本藏
7	不明	吳 ₂ 晉 青釉 不明	不明	日本正木氏藏
8	不明	西晉永康元年 (三〇〇) 青釉 不明	不明	
9	不明	西晉 青釉 不明	不明	日本松岡美術館藏
10	紹興?	吳 ₂ 晉 青釉 不明	不明	

文 獻 出 處

109 8 7 6 5 4 3 2 1

王步藝「蕪湖赭山古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十二，四十六頁右上圖。
 王步藝前引文。
 江西省博物館(程應林)「江西瑞昌馬頭西晉墓」『考古』一九七四—一，圖版伍，一。
 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s, Illustrated Catalogue (Sotheby & Co. 1940) p. 21.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の遺物と其の遺跡」第七圖及註一一，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編『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收，一九四一。
 A. D. Brankst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1938-39, Vol. 16.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の遺物と其の遺跡」『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收，一一三—一二三頁，同出處(4)。
 小山富士夫「青磁」圖一，陶磁大系三六，平凡社，一九七八。
 小山富士夫「青磁」圖一，陶磁大系三六，平凡社，一九七八。
 馮先銘「記一九六四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文物』一九六五—二，三七頁。
 松岡美術館收藏中國陶磁名品展圖六，日本經濟新聞社，一九八三。
 蔣玄伯、秦明之編著『中國瓷器的發明』(紹興出土古陶瓷研究)圖版二九，左，公私合營藝苑真賞出版，一九五六。

表四 穀倉之外三國兩晉時期陶瓷器所見佛像

編號	出 土 地 點	時 代	形制、釉色	裝(佛像)飾部位	出 土 年 代	備 註
1	不明	西晉	青瓷豆	器身	不明	
2	浙江省紹興九巖窖址	六朝	青瓷坐佛		一九三七	三件
3	江蘇省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吳墓	吳鳳皇二年 (二七三)	坐佛		一九五〇年代	三件
4	浙江省吳興縣西晉墓	西晉元康六年 (二九六)	青瓷雙耳罐	肩腹之間	一九七九	
5	不明	西晉	青瓷奩	腹部	不明	
6	湖北省宜昌市晉墓	西晉	青瓷博山爐	托口與器體之間 飾三尊坐佛	一九八三	
7	湖北省鄂城	六朝	青瓷佛像洗	不明	不明	
8	不明	西晉	青瓷奩	器身	不明	
9	浙江省紹興(?)	吳?西晉	佛像浮彫壘 (釉已剝落)	器肩	不明	
10	浙江省紹興(?)	晉	青釉坐佛		不明	

文 獻 出 處

- 1 A. D. Brankston 「Yüeh ware of the "Nine Rocks" Kiln」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PLATE II. F.
- 2 A. D. Brankston Ibid., PLATE. II. F.
- 3 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南京出土六朝陶俑』圖三，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一九五八。
- 4 朱伯謙『越窖』圖三十五，中國陶瓷全集四，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一九八一。
- 5 朱伯謙(同上書)圖四十二。
- 6 宜昌市文管處(周之梅)「宜昌市六朝墓群清理簡報」『江漢考古』一九八四一一(總十期)圖二、五。
- 7 蔣贊初『鄂城六朝考古散記』『江漢考古』一九八三一，三十七頁。
- 8 日本東山健吾教授藏。筆者實見。
- 9 蔣文怡、秦明之編著『中國瓷器的發明』(紹興出土古陶瓷研究)圖版二十六、左，公私合營藝苑真賞社出版，一九五六。
- 10 蔣文怡、秦明之編著(同上書)圖版三十八，下左。

附 註：

【註一】塚本善隆『中國佛教通史』六一頁、六七～六八頁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一卷春秋社一九七九

【註二】藤井有隣館學藝部編集『有隣館精華』彩圖二、二版、一九七七。包括上述圖錄在內，該佛像一般被認為是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前期的作品，但松原三郎氏則進一步推定該作品的年代在三世紀末期（松原三郎編『改訂東洋美術全史』一六四頁、東京美術、一九八一）。

【註三】李復華、陶鳴寬『東漢崖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七——六、八八頁圖右上、右下。

【註四】聞有『四川漢代畫像選集』圖五九的說明。聯羣出版社、一九五五。轉引自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文物』一九八〇——五、七七頁。

【註五】該陶座圖版參見曾昭燭等著『沂南古畫像石墓發掘報告』六六頁、插圖四二、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一九五六。較清楚的圖片可參見『南京博物院』中國博物館、圖七七、講談社、一九八二。

【註六】應該指出的是、俞偉超（【同註四】七五頁）一文中，錯誤地將該三尊像陶座解釋做「中爲釋迦像，兩側爲大勢至菩薩和觀世音菩薩像」。

【註七】參見俞偉超（同註四）六八～七七頁。

【註八】連雲港市博物館「連雲港市孔望山摩崖造像調查報告」『文物』一九八一——七、一～七頁。

俞偉超、信立祥「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代考察」『文物』一九八一——七、八～一五頁。

步蓮生「孔望山東漢摩崖佛教造像初辨」『文物』一九八二——九、六一～六五頁。

閻文儒「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題材」『文物』一九八一——七、一六～一九頁及同氏「再論連雲港孔望山佛教造像的題材」『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四、一一～一四轉六八頁。

【註九】李遇春「新疆三仙洞的開窟時代和壁畫內容初探」『文物』一九八二——四、一三～一七頁。

【註一〇】關於沂南畫像石墓中室擎天柱南、北兩面頭帶項光的立像，原報告（曾昭燭等同註五、六六頁）認為項光雖是佛教影響下的產物，但上述二立像並非佛像，「而是著普通衣服的童子」。塚本善隆氏則稱它們是神仙般的佛像或佛像般的神仙（塚本善隆同註一、一五九頁）。其次，小南一郎氏從其圖像配置加以考察，認為極有可能爲佛教圖像（小南一郎「佛教中國傳播の一樣相——圖像配置からの考察——」『展望アジアの考古學——樋口隆康教授退官紀念論集——』收，五一五～五二五頁、新潮社、一九八三）另外，林已奈夫氏則認為南面的立像或爲火神祝融，北面的立像或爲司掌刑殺、降雨、水利工程的水官玄冥（林已奈夫「漢代鬼神の世界」『東方學報』京都四十六冊、二三八～二四〇頁、一九七四）。

【註一一】閻孝慈氏雖同意其題材爲佛教造像，但認為這批造像的年代「大致可定爲曹魏以後，元魏以前」（閻孝慈「論孔望山佛教造像的年代問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三——三、六六～六七轉七三頁）。另外，夏鼎氏（夏鼎著小南一郎譯『中國文明的起源』五〇頁，日本放送協會，一九八四）和東山健

【註一〇】吾、鎌田茂雄等研究者則對於其題材是否為佛教？其時代是否可上溯到漢代？提出懷疑。（鎌田茂雄東山健吾、金岡昭光△座談會）「佛教の東漸をめぐって」『歴史公論』十卷八號、一六〇一七頁、一九八四。其次，阮榮春氏則又主張，孔望山上部崖部羣像的時代均在唐代前後，下部的臥像（即所謂的「涅槃像」）時代雖較早，但不會早過於隋代。（阮榮春「孔望山佛教造像時代考辨」『考古』一九八五一一、七八八〇八十七頁）

【註一二】高觀如「中印佛教關係」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一輯收、一六三頁、知識出版社、一九八〇。

【註一三】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藍蔚）「武昌蓮溪寺東吳墓清理簡報」『考古』一九五九一四、圖版柒之八。

【註一四】鎮江博物館劉建國「鎮江東晉墓」『文物資料叢刊』八、二七頁、圖二〇、一九八三。

【註一五】以佛像做為裝飾圖案的三國銅鏡，在湖北省鄂城、湖南省長沙、浙江省武義等地都有發現。詳見王仲殊「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綜論」『考古』一九八四一五、四七〇頁。

【註一六】這類作品的命名極為分歧。馮先銘「記一九六四年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古代藝術展覽』中的瓷器」『文物』一九六五一二、三七頁；易家勝「南京郊縣四座吳墓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八、七頁、一二頁、一三頁等稱「堆貼人物樓閣繡」或「人物堆塑繡」。羅宗真「江蘇宜興晉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七一四、九八頁等稱「飛鳥人物繡」。王志敏「從七個紀年墓葬漫談一九五五年南京出土的孫吳兩晉青瓷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一一、八頁；金崎「南京甘家巷和董家山六朝墓」『考古』一九六三一一六、三〇四頁；三次男「陶器講座」中國I、古代二七九〇二八

二頁雄山閣一九八二等稱「魂瓶」、「魂亭」。Margaret Medley "The Chinese Potter" p. 65. Second edition Pardon 1980 稱「骨灰罐」。金重德「越州古瓷研究」四頁，考古叢書第一輯，上海、一九四四，稱「宇宙壺」。陳萬里「瓷器與浙江」、四二頁，一九四六；馮先銘「我國陶瓷發展中的幾個問題」『文物』一九七三一一七、二二頁等稱「穀倉」。岡崎卯一「紹興出土の二三の飾壺」『寶雲』三十三冊、八二八八九頁、一九

四四稱「飾壺」。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倉聖明智大學刊本、一九二七稱「陶壺」。張孫亢「紹興出土古物調查記」『文瀾學報』三一、一五頁、一九三七，則將上面堆砌有亭臺人物又加飾有五只小壺的作品稱為「五壺罇」，另一方面又將僅於上面堆砌有亭臺樓閣的作品稱為「神亭」。目前日本方面的絕大多數研究者，即沿襲張氏「神亭」的叫法，但卻又將具有張氏所謂五壺罇形式的上部堆塑複雜裝飾的作品，一併歸入「神亭」的範疇。例子甚多，這裏就不一一指出了。

【註一七】馮先銘同上註（一九七三）二二頁。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一二五、一六一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朱伯謙『越窯』一六九頁，中國陶瓷全集四、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一九八一。

【註一八】長谷部樂爾氏認為南京附近出土的「五壺罇」（五聯罐）可能即「穀倉」的「原形」（長谷部樂爾「魏晉南北朝の陶磁」二三六頁、『世界陶磁全集』一〇、中國古代、小學館、一九八二）。易家勝氏更進一步推測「五聯罐」至孫吳五鳳年間（二五四～二五五）以後就已消失，「代之而起的很可

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能就是陶瓷人物堆塑罐（筆者按：即穀倉）」（易家勝同註十六、一三頁）。筆者雖然同意三國兩晉的穀倉有可能由東漢時期的五聯罐發展而來的看法；如浙江省奉化東漢墓平四年（一七五年）墓出土的器身貼飾人物、鳥獸的青瓷五聯罐，可能即為穀倉的前身（奉化縣文化館王利華寧波市文管會林士民「奉化白杜漢墓平四年墓清理簡報」『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二〇七、二二一頁、一九八一）。然而南京梅家山出土的素陶五聯罐（屠思華、李鑑昭「南京梅家山六朝墓清理記略」『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六一四、一七頁、圖一七）從伴隨出土的青瓷雞頭罐、虎頭罐等作品看來，筆者認為該墓很難早過孫吳晚期，而有較大可能為西晉時期墓葬。另外，福建福州附近也出土了僅飾少量人物貼塑的青瓷五聯罐（曾凡「南福鐵路工程福州附近的考古發現」『考古通訊』一九五八一、六〇頁、圖四）。該作品被認為是東晉時期產物（曾凡等『福建陶磁』圖二九、中國陶瓷全集二七、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十美乃美、一九八三）。上述例子表明了，穀倉出現之後，五聯罐仍然持續燒造。後者的數量雖較少，但兩者於三國、兩晉時期實為並存的兩個樣式。

【註一九】羅宗真同註一六、九八頁。

【註二〇】馮先銘同註一六（一九六五）三七頁。

【註二一】馮先銘同註一六（一九七三）三三頁。

【註二二】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化館（劉興肖夢龍）「江蘇金壇出土的青瓷」『文物』一九七七—六、六三頁。另外，三上次男同註一六、二八一頁也引用了

這個看法。

【註二三】長谷部樂爾同註一八、二三六頁。

【註二四】易家勝同註一六、一三頁。

【註二五】郭白「略談我國古代陶瓷的裝飾藝術」『硅酸鹽學報』六卷四期、二九五頁、一九七八。又見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二一六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二。

【註二六】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七〇—七一頁。

【註二七】陳萬里同註一六、四〇頁。

【註二八】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三頁、一九五六、上海。

【註二九】該作品的圖片參見小山富士夫「古越磁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第八卷中國上代篇』二八頁、插圖一八〇、河出書房、一九五五。

【註三〇】林華東展汝「寧波慈溪發現西晉紀年墓」『文物』一九八〇—一〇、九三頁圖六。

【註三一】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三、圖版拾伍之三一九八〇。

【註三一】參見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國明器泥象』圖三六、一九五四及大阪市立美術館編『六朝の美術』圖一之七四、中國美術展シリーズ二、一九八〇（複刻補訂版）。前者將之定為三國時期越州密系作品；後者則將之定為南朝時期作品。

【註三二】易家勝同註一六、一二頁。

【註三四】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七〇～一七一頁。

【註三五】朱伯謙同註一七圖版九六的說明

【註三六】（高至喜報導）「湖南桂陽縣城外發現古代銅器及瓷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七、一六三頁。

【註三七】王仲殊「關於日本的三角緣佛獸鏡——答西田守夫先生」『考古』一九八二—六、六三四頁。

【註三八】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二。在這裏筆者係依據『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六、二四八三頁、台北重刊本。前揭倉聖明智大學的刊本（同註一六）中無「吳會稽陶壘」題字。另外，同氏『金泥石屑』、『羅雪堂先生全集』續編冊十三的原目錄中則記為「吳始寧陶器」文華出版公司印行，五三二頁。

【註三九】大村西崖著陳彬蘇譯『中國美術史』三四～三五頁、台灣商務印書館版、一九六七。

【註四〇】金重德『越州古密研究』四頁、考古叢書第一輯、上海、一九四四。

【註四一】Fujio Koyama "The Yieh-Chou yao Celadon Excavated in Japan" "ARTIBUS ASIAE" Vol. 14, p. 32, Fig. 5, 1951. 又小山氏於上文

中並未言明該穀倉係羅振玉所有，筆者是根據羅氏『古明器圖錄』所載圖版確認。

【註四二】陳萬里同註一六、四二頁。

【註四三】Th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s, Illustrated Catalogue (Sotheby & Co. 1941) P. 21 引自梅原末治「浙江省紹興出土の遺物と其の遺跡」『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史學論文集』收、一一三頁、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一九四一。

【註四四】金華地區文管會（貢昌）「浙江金華古方六朝墓」『考古』一九八四—九、八一六～八二五頁。以及貢昌「談婺州密」『中國古代密址調查發掘報告集』收、二二～三二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但值得留意的是，「談婺州密」一文所載出土於浙江省蘭溪永昌的穀倉（二四頁、圖二之二）與發掘報告書所載金華古方第十二號墓出土的作品完全一致（圖版伍之五、六），應為同伴器物。因此蘭溪永昌是否出土有婺州密穀倉，值得懷疑。本文並不列入計算。

【註四五】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六二頁。

【註四六】張拯元（同註一六）一五頁。

【註四七】岡崎卯一（同註一六）八六～八七頁。岡崎氏誤釋羅振玉所藏穀倉之「會稽出始寧」碑銘的「寧」（寧）字為「盧」，因而認為穀倉是香爐。

【註四八】引自南京博物院編輯『南京附近考古報告』七頁。南京博物院集刊之一、上海出版公司印行、一九五二。

三國兩晉時期越密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 【註四九】長谷部樂爾「褐釉裝飾壺とその周邊」『大和文華』五十四、二二頁、一九七一。
- 【註五〇】佐藤雅彦『中國陶磁史』七二頁、平凡社、一九七八。
- 【註五一】Margaret Medley (同註一六) 六五頁。
- 【註五二】如一九五三年發掘江蘇省宜興周墓墩二號墓時，既出土有青瓷穀倉，同時於墓室擾土中發現有人牙及人骨（參見羅宗真同註一六、九二頁）。
- 【註五三】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張志新）（同註三一、三六頁）認為吳縣獅子山三號墓所出穀倉碑文「用此」之下一字可能做「霽」，而「霽」亦做「罐」，瓦器也。上述釋文也被引用於近年來出版的『中國陶瓷史』二書中（同註一七、一四〇頁）。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可能涉及「穀倉」在當時的真正稱呼。但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證實。
- 【註五四】唐金裕「漢初平四年王氏朱書陶瓶」『文物』一九八〇—一、九五頁。
- 【註五五】中村不折『禹域墨寶書法源流考』八頁、一九二七。
- 【註五六】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南京六朝陶俑』圖三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一九五八。
- 【註五七】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藍蔚）（同註一三）圖版柒之三、五。
- 【註五八】湖南省博物館（高至善）「長沙兩晉南北朝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一九五九—三、八六頁圖五及圖版陸、拾貳等。
- 【註五九】王志敏、朱江、李蔚然編（同註五六）圖四。
- 【註六〇】塚本善隆（同註一）一五九頁。
- 【註六一】如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三二七頁、文物出版社、一九七九；及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四六頁。
- 【註六二】值得注意的是，宜昌市出土的博山爐的造型或裝飾技法，均與同省鄂城城西山南麓東吳孫將軍墓出土的博山式薰爐一致。後者薰盤三面外側各飾一尊報告書稱為「侏儒」的坐像（參見鄂城縣博物館「鄂城東吳孫將軍墓」『考古』一九七八—三、一六六頁及一六七頁圖九—二，另圖版柒—三）；而該「侏儒」坐像的造型也與宜昌市出土的博山爐上所飾佛像極為類似，有可能即為佛像。但這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或清楚的圖片來證實。
- 【註六三】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五八頁。
- 【註六四】該作品由筆者的老師東山健吾教授所藏。
- 【註六五】A. D. Brankston "Yüeh ware of the 'Nine Rocks' KILN" p. 260. PLATE II. F "Burlington Magazine" 1938, Dec.
- 【註六六】朱伯謙（同註一七）一七五頁。
- 【註六七】引自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一八三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

【註六八】水野清一「中國における佛像のはじまり」『佛教藝術』第七號、一九五〇『中國の佛教美術』收一七～一八頁、平凡社、一九六八。

【註六九】長谷部樂爾（同註一八）二三六頁。

【註七〇】中國硅酸鹽學會編（同註一七）一七〇～一七一頁。

【註七一】王仲殊（同註一五）四七〇頁。

【註七二】引自任繼愈主編（同註六七）一八六頁。

【註七三】王仲殊（同註一五）四七〇頁及（同註三七）六三〇～六三七頁。

【註七四】徐華芳「三國兩晉南北朝的銅鏡」『考古』一九八四一六、五五八頁。

【註七五】塚本善隆（同註一）一四三頁。

【註七六】鎌田茂雄『中國佛教史』二九頁、岩波全書三二〇、岩波書店一九七九。

【註七七】任繼愈主編（同註六七）一六六頁。

【註七八】鎌田茂雄（同註七六）二四、二八頁及塚本善隆（同註一）七三～七四頁、一二一～一二三頁。

【註七九】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羣」『考古』一九七六一五、三三頁及同頁圖九拓本。又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同註一六）一四頁參照。

【註八〇】參見南京博物院（易家勝）（同註一六）一四頁。

【註八一】Mary Tregear "Catalogue of Chinese Greenware" p. 25, 30, Oxford, 1976.

【註八二】關於佛教與葬送禮儀的結合，可參見小南一郎氏（同註一〇）的簡短論述。

【註八三】這裏是指出土文物或傳世作品上所見到的一般裝飾傾向而言。例外的少數，如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傳為河南省上蔡縣出土的南北朝時期青瓷蓮花尊，即於尊頸下部兩側各貼飾有兩軀帶有背光的交腳並坐佛像（參見楊文和范世民《青瓷蓮花尊》『文物』一九八三一、一八六頁及圖版捌之二）。另外，一九七二年陝西省銅川黃堡鎮耀州窯址出土的唐代黑釉帶座罐（塔形罐），於座上也飾有幾尊佛像（參見李知宴朱捷元「唐白釉貼花鉢白瓷吐孟和黑釉罐」『文物』一九七九一一圖版拾壹之三及銅川市耀州窯博物館盧建國「耀州窯裝飾藝術」『考古與文物』創刊號一九八〇、一二三～一二四頁和圖版拾之二）。

【註八四】考古發掘表明，中國遠在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遺址中就存在有蓮花（朱伯謙同註一七、一七七頁）。『詩經』上也有「山有扶蘇、隰有荷花」等描述蓮荷的記載（參見梁國寧編『園藝史話』八〇頁、農業出版社、一九八三）。著名的春秋時期「蓮鶴古壺」（『中國古青銅器選』圖五六、文物

三國兩晉時期越窯青瓷所見的佛像裝飾

出版社、一九七六）或山西省侯馬戰國早期墓（編號五八、H四、M六）出土的陶壺（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侯馬地區東周、兩漢、唐、元墓葬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五九一六、四七頁）等作品均以蓮瓣做為器物裝飾。飾有蓮瓣紋的漢代陶瓷也有若干實例：如湖北省當陽縣東漢畫像石墓出土的肩部刻劃覆蓮瓣的醬褐釉四耳罐（沈宜陽「湖北當陽劉家子東漢畫像石墓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一、一九七七）或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漢代「綠褐釉蓮瓣紋奩」（上海博物館所藏「中國歷代陶磁展」圖一三，日本、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從南京象山東晉無名氏墓出土的青瓷蓮瓣四耳壺或貴州平壩馬場第三四號墓出土的東晉末至南朝的青瓷蓮瓣紋六耳壺（參見矢部良明「北朝陶磁の研究」一一〇頁、註四七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第十六號，昭和五十五年，一九八〇），以及浙江省蕭山縣上董窰址或寧波雲湖窰址發現的不少刻劃蓮瓣紋的標本看來（黨華「浙江蕭山縣上董窰窰址發現記」『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圖五；林士民「浙江寧波雲湖窰調查」『中國古代窰址調查發掘報告集』九——一四頁、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蓮瓣紋到了東晉後期隨著佛教的盛行，重新賦予蓮花新的意義而再度登場；但卻不能說中國的蓮花裝飾是起源於佛教。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